

历史
伟人
讲座
国学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吴宗国



7
242.7
3

87
K242.7
13

“伟大祖国”历史讲座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吴宗国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B

379371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吴宗国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25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册

统一书号：11201·50 定价：0.35元

编者的话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创造了著称于世的灿烂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无数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过很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近百年来，我们的祖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疯狂的侵略掠夺。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学习祖国的历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为此，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伟大祖国”历史讲座，并编辑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将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每本书末附有北京图书馆馆藏有关参考书选目，便于读者参阅。

编者

目 录

一、从太原起兵到削平群雄.....	(1)
二、深刻的教训.....	(5)
三、玄武门之变.....	(8)
四、治国方针的确定.....	(9)
五、贞观君臣论治.....	(12)
六、广任贤良.....	(22)
七、劝农务本.....	(28)
八、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	(33)
九、贞观中后期政治.....	(38)

附：北京图书馆馆藏有关参考书选目..... (45)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历来被称颂为我国封建社会一个理想的治世，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被封建历史家赞美为夏商周三代以后无有可比的致治之君。唐太宗以后，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把贞观之治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象唐太宗这样生前创建了丰功伟业，死后又以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本人的形象影响着后世的帝王，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一、从太原起兵到削平群雄

李世民生于公元599年1月23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的父亲李渊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袭封唐国公。他的祖母独孤氏，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与北周明帝和隋文帝的皇后是姐妹。他的母亲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李世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关陇贵族家庭。

隋文帝开皇(581—600)后期到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是隋朝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兵力

强盛。封建国家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洛阳附近的洛口仓，所储米粟多达二千余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库房里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可是好景不长。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穷奢极侈，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在604年到610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修缮离宫，修筑长城，开凿运河，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经常远出巡游，南至扬州，北至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至张掖，每次都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又连年进行战争，特别是对高丽的战争，更是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几百万壮丁在繁重的徭役劳动和战争中死亡，妇女也被征去服役。农村里只剩下了老弱和儿童。生产无法进行，“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农民不能忍受这样残暴的统治。公元611年（大业七年）王薄在山东章丘长白山率众起义，揭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原已归顺隋朝的东突厥，也不断南下骚扰。

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镇压山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十六岁的李世民也跟着到了太原。这一年恰好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李世民应募从军，参加了救援隋炀帝的战役。第二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为防御突厥，李渊从所部五千人中，选善能骑射者二千人组成骑兵，饮食居止，驰骋射猎，都与突厥人一样。这时，甄翟儿率领农民起

义军二万余人进入西河郡(今山西汾阳)，逼近太原。李渊统步骑五六千人南下镇压，相遇于雀鼠谷口。李渊使用轻骑突袭，取得了胜利。李世民也参加了这一次战役。李世民的这一段戎马生活，使他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对他后来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具有重要影响。

突厥乘李渊还太原之机，进攻马邑。隋军失利。隋炀帝派人囚捕李渊，并令送往当时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即扬州)治罪。后因瓦岗起义军逼近东都洛阳，形势日益紧张，又遣使释放李渊，恢复旧任。这时候，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隋的军队被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河南的瓦岗军和江淮的杜伏威起义军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久蓄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积极准备起兵。李世民也担负了掌握新招募来的军队和联络地方豪杰的工作。李渊派晋阳令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便抓紧隋军与瓦岗军相持于东都城下，无暇西顾的时机，于617年(大业十三年)5月从晋阳(即太原)起兵。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分别率领左右军，进军关中。

占领长安后，特别是618年5月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太子身分经常留居长安，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李世民则领兵出征。他先后消灭了割据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薛氏势力，打败了在突厥支持下占领了山西河东大部分地区的刘武周，逼降了盘据在东都

洛阳的王世充，为统一国家的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学会了指挥战争。618年（武德元年）6月，盘据金城的薛举前来攻打泾州（今泾川），李世民率兵抵御。浅水原之战，薛举乘唐军不备，暗中派兵从唐军阵后发起进攻，唐军被打得大败。和李世民一起率兵迎战的宰相刘文静因此被罢官。这次失败给李世民的教育不下于他在山西参加过的对突厥和甄翟儿的战役。在第二次对薛举子薛仁果作战时，李世民即采取了类似的战略。战场仍在浅水原。接战时，李世民一面派兵到浅水原南布阵，摆出决战的架式，同时，率兵迂回到敌军阵后发起进攻，并亲率精骑突入敌阵，击溃了薛军。又率轻骑乘胜追击，进围薛仁果所据之析塘城（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北），使敌人的溃兵不能入城坚守。薛仁果被迫出降。在此后的战斗中，他都注意利用骑兵突入敌阵或出敌阵后，出奇制胜。

在指挥作战时，李世民善于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抓住战机，集中主力，进行攻击。在作战过程中，能身先士卒，不怕疲劳，率领部队追击溃逃的敌人。620年春秋之交，唐军切断了刘武周军队的运粮线，刘武周部将宋金刚被迫从浍州（山西翼城）北撤。李世民率轻骑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转战数十合，士卒疲弊，军粮也没有运上来。有人建议停营休息，待军粮和后继部队齐集后再行决战。李世民说：“功者，

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通典》卷162）指挥军队继续前进。他自己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终于击溃了宋金刚的军队，取得了对刘武周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

李世民曾经说过：“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通鉴》卷192武德九年）在战争中，李世民锻炼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二、深刻的教训

621年（武德四年）春，李世民率兵围攻盘据洛阳的割据政权王世充。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看到西北各武装集团都已被唐消灭，唐打败王世充后，下一个目标将会是自己，便亲自率兵西救洛阳。李世民接受薛收的意见，对东都围而不攻，亲自率军进据武牢。两军相持月余，最后李世民计败窦军，窦建德被俘，窦建德领导农民起义军占领河北以后，建立了夏政权。他在洺州（今永年）一带劝课农桑，境内无盜，商旅野宿，深得河北人民的爱戴。直到唐朝后期，

河北、山东的人民仍然怀念这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谈论着他的事迹，并为他立庙，对他进行祭祀。这次窦建德率领前来对抗唐的部军队，主要是新收编的孟海公和徐圆朗之众，并没有从河北征调军队。而窦建德兵败被俘后，却导致了夏政权的顷刻瓦解。夏的百官包括窦的妻子都投降了唐朝。这中间有各方面的原因，而当时暴隋已亡，统一之势已成，人心思定，却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唐王朝如果能采取恰当的措施，河北、山东地区的形势是可以很快稳定下来的。

可是，唐王朝在重建这个地区的统治时，不是实行适当的政策去进一步缓和阶级矛盾，也没有依靠那些和起义军有一定联系的一般地主士人。唐高祖李渊派将军秦通武将兵屯洺州，并派兵分镇山东诸州。任命山东士族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到洺州就地选任山东州县的官吏。这就是说，要依靠武力和那些在农民起义中没有被镇压而成为漏网之鱼的山东士族子弟来重建山东地区的封建统治。这些人上台后，便立即对起义军将士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一方面追捕起义军将领，把他们流放到远地，同时迫害起义的参加者，“以法绳之，或加捶撻”（《通鉴》卷189）。这就迫使农民重新拿起反抗隋王朝时使用过的武器，为保卫自己在斗争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和生存权利而进行战斗。就在李世民身披黄金甲，在铁骑万匹的护拥下，在军乐的大吹大擂声中凯旋归长安的十天之后，

窦建德旧将刘黑闼率众于漳南起义。

李世民被重新派往山东，镇压刘黑闼起义。这时他已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隶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和诸州，有权任命官吏，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他在洛阳观看隋的宫殿时虽曾发出过“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通鉴》卷189）的感慨，但在一连串的军事胜利面前，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于当时的阶级关系，他并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在镇压刘黑闼起义时，他提不出任何新的措施，所使用的仍是军事镇压的老办法。面对拼死抗争的农民，仗打得颇不顺手。唐军与刘黑闼军相持达六十日之久，李世民本人也被刘黑闼的军队包围，险些做了俘虏，还是尉迟敬德拼死破围而入，才把他救出。最后，李世民采用事先在洛水上游筑堰，决战时决堰放水的办法，才把起义军打败。打败后，继续采用残酷镇压的办法来惩治起义军。正如刘黑闼军失败后魏征对太子李建成所说的：“黑闼虽败，杀伤太众，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

（《新唐书·隐太子传》）果然，不到半年时间，起义又在河北平原上发展起来了。最后，还是魏征协助李建成以政治瓦解的办法，释放全部被俘和囚禁的起义军将士，对参加起义者不予追究，才平息了河北山东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

李世民虽然没有解决山东问题，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对于他认识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认识自己存在的某些弱点，对于他政治思想上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

621年10月，刘黑闼起义尚未发展成燎原之势，唐统治者还不十分在意。李世民也认为海内渐平，乃开文学馆于宫西，以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薛收、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出教，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此后，在公事之余他就到馆中与诸学士讨论典籍。十八学士大多为文士和儒生。他们对于南北朝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唐初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不能帮助李世民形成一套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都博通文史，熟悉儒家经典。在他们的帮助下，李世民初步接触到封建统治理论和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

三、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在削平群雄的战斗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威望越来越高，势力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凭借这些资本，他要谋夺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也设法扩大自己的力量。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初四，

李世民在妻弟长孙无忌、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宫城北门玄武门，他埋下伏兵，乘李建成入朝无备，亲自射杀建成。四弟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赦免了建成、元吉党羽。原太子洗马魏征虽曾劝建成早除世民，但李世民素重其才，引为自己的属官。又召回被流放的原太子幕僚王珪和韦挺，皆任为谏议大夫。

李建成在讨平刘黑闼时，曾乘机结纳山东豪杰。一些地方官吏和军将都和他有联系。李建成被杀后，他们颇不自安，有的躲藏起来，有的想起事。李世民便派魏征到山东宣慰。魏征到山东后，释放了地方官准备械送到长安去的两个原建成、元吉官属，很快稳定了山东局势。

四、治国方针的确定

唐太宗即位后，很快就达到了致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誉称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实行了一整

套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推动社会前进的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切合实际，符合人民愿望的措施分不开的。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的确定和实行，有一个过程。

唐太宗初即位时，一是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亟待恢复；二是还有一些农民在继续进行斗争。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对待农民的态度和对农民采取什么方针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在朝廷中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是士族贵族出身的大官僚。他们在隋末控制各级政权，作恶多端。关中的起义军攻破了他们的庄园，山东、河北的起义军抓住隋官及士族子弟就杀。他们在农民起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因而对农民怀有极大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他们主张对农民实行高压政策。另一派则是山东地区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僚。隋末的暴政也损害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的利益，有些人很早就参加了起义。大多数则是或长或短在起义军中待过一段时间。他们主张通过政治改革，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626年（武德九年）朝廷上的两次辩论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一次是在唐太宗初即位时。唐太宗与群臣谈论“自古理政得失”。唐太宗说：“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对于能否迅速致治没有把握。山东士族出身的大官僚宰相封德彝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人心越变越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

治而不能，岂能治而不欲。”他的意思是大乱之后，不能立即致治。只有象秦汉那样严刑酷法，运用暴力，才能压服人民。山东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谏议大夫魏征则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治，思治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指出大乱之后人民渴望致治，只要教而化之，采取适当措施，上下同心，是可以迅速致治的。唐太宗“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熟”，对民间情况有一定了解。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并看到魏征两次解决山东问题的成功。事实告诉他，高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当魏征用历史事实说明大乱之后可以致治，分析当时的阶级动态是人心思治，指出对百姓应实行教化的方针时，他霍然开朗，接受了魏征的主张。

另一次辩论发生在同年十一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盜。有人重弹“重法以禁之”的主张。唐太宗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意见。他说：“民之所以为盜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盜，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192)

这样经过几次辩论后，治国方针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唐太宗坚持实行这个方针，“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大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笔者注：五帝、

三王统治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夷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五、贞观君臣论治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经常与大臣在一起，结合总结隋末农民起义导致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讨论怎样安邦治国，巩固封建统治。贞观君臣很重视对封建统治理论和历史的学习。唐太宗曾命魏征编纂了一部《群书治要》，摘要汇编了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中有关治道和兴亡的内容，作为自己和诸王学习的材料。他还下令设立史馆，修定完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六部史书，以为统治鉴戒。因此，贞观君臣在讨论时，言必先王孔子教导，语必历代兴亡教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君臣论治”。贞观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由唐代历史家吴兢分类汇集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收录了其中许多内容。南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又按时间先后辑录在一起，题名《贞观君臣论治》。司马光收录时，在内容上有取舍，在文字上也有改动，有些改动离原意还较大。因此，要了解贞观君臣论治的本来面目，还必须阅读